
目 录

忆刘则先(蜀屏)烈士.....	易奉倩(1—6)
谢持传略(下).....	苏铁生(7—11)
易昌棣倩愚先生及夫人宋令修之生平.....	
.....	李湘琚(12—16)
富顺爱国献金运动亲历——曹禺名话剧	
《雷雨》四十年前在富顺的首次演出.....	杨 毅(17—20)

3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印

忆刘则先（蜀屏）烈士

易 奉 倩

我与蜀屏相识，记得是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苦的年代的一九四二年仲夏，地点就在西湖读易祠侧他的家里。由一位叫何泽藩的医生引路，一道去看他，因早就听说他是一个“洪水猛兽”般的人物，是从延安回来的。我那时高中毕业了一段时间，教了一年小学又失业了，平日思想很烦闷，很想去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进得屋去，正遇上他抱着小孩在喂饭，我们在一间破败不堪的厅房里坐下谈话。那里除一张方桌，几张破椅和一张竹凉床外，屋角里还堆有破烂、檐前的蛛网也未除去，破败的景况十分鲜明，真是萧然四壁。我们因是初次见面，谈话不多，除何医生向他讲了些关于我的情况外，我们逗了一阵孩子就想告辞，这时他突然提到他与我大哥公度是同学，要我常去玩。就这样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三年中我与他就在这间破屋里多次接触，促膝谈心，议论国事，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那段时间的艰苦生活。他原来的爱人黄静娴，当时与他已不在一起，与他共同生活的是后来在工作中认识的傅德玉，傅比他年龄约小十岁，因他们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收入，才找到蜀屏的远房堂兄刘孝和，推荐傅去县政府会计室当个小职员，就由她

一人工作的微薄收入养活一家五口，那时他们已生了第三个女儿，德玉每天去县政府上班，蜀屏则在家中烧饭、洗衣、照料孩子。做饭没有锅子，用柴火将米煮熟，倒出米汤，将饭焖在锅里，然后铲起来盛在簪箕里，我在他家里多次吃饭都用的这个办法。因为我是客人，有时他还掏钱去买半斤白酒，用盐炒了黄豆做菜招待。那时我们的兴致很高，并不因这有酒无肉的景况自卑，而在真挚的谈话中情绪往往更加激昂，谈古论今，从蒋介石的中央政权骂到地方保甲制度；从发国难财的暴发户骂到市侩奸商；从古到今，涉及很广。由于经济困难，他只穿一件破旧的兰布长衫，一双布鞋，没有蓄发就剪个光头，这样一身装束就介于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之间，什么也不像。有一个进理发店就遭到师傅的白眼，说他没有进过“理发厅”。他出来向我讲，其实数年前在上海十里洋场生活，倒真的穿着洋服进过理发厅的。对社会上的以衣着看人，他很愤慨，骂起那些衣冠楚楚的绣花枕头来。那时还未用心灵美这个词，讲的是内心修养，讲的是文化知识素质，其实为了工作的需要，我认为那一身穿着是很美好的，它反映了一种坚强朴实的品格。傅德玉也一样，穿一件深兰色的旧旗袍，布鞋，夏天多一件灰色过膝的绸衫，因为她那时的公开身份是公务员，看起来更有精神。她那时才二十多岁，很健壮，可是由于孩子的拖累，下班回家又要洗晒衣物，又要替孩子喂奶，那时小女儿仁爵还不到一岁，每天总是弄得筋疲力尽，当我和蜀屏正谈得起劲时，她就在床上睡着了。不过在她下班进屋和我们一起吃饭时，总是有说有笑，而且大部

分有关政府的新闻就是由她传出来的。全家的经济来源由她一人承担，她精神愉快，不以为苦。

蜀屏原是富顺县中学堂十五班的学生，那时正当五四运动之后。在这十分闭塞的小县城里，青年学生所接受的新思想是不完全的。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工商业，振兴自己的祖国，不愿受外敌欺凌这些朴素的爱国思想则正处于高涨的时候。大约是一九二七年，我们县城里发生了学生打基督教堂和洋货的事件，将教堂钟楼上的铜钟砸碎了，将商店里的进口货如搪瓷盆之类通通摔到街头打烂了。自然游行的队伍免不了还有标语口号。那时是军阀驻防，事后就开始抓捕肇事的学生。蜀屏告诉我，那时他并不是共产党，只是参与者，不得已只好出走，逃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到上海后的事了。

抗日战争开始后，蜀屏到了延安，并在瓦窑堡参加干训，再分派回四川工作。先后在华阳、双流、温江及西康的汉源等处负责党的中心县委的工作。到了一九四二年时，又出现了反共高潮。在成都，党的组织被破坏了，蜀屏与他爱人幸好逃出了虎口，潜居富顺这小县城里。我与他开始接触就正是在这段时间。因为他离开家乡多年，早年相识已经不多，不易惹人注意，而现在回来又是一副落魄的样子，就更不引人注意了。

有一次我从乡下进城，又到了他的家中，见他一人坐在那间破厅里读报，脸上有泪痕，一下使我愣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待我坐定他就将报纸塞入我手中，并愤恨地说：“真是狼心狗肺”！我一

看是张过了期的重庆新华日报，上面大版开了“天窗”，上面是周恩来同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那四句著名的题字，这样我才知道发生了皖南事变。从此，我就不定期的从他手中将一些过时的新华日报带回乡下读。报纸所记，有些已不算新闻，但从中寻找揭露蒋介石的材料仍觉非常有力。时间久了，我们彼此更熟悉了，才知这些报纸是傅德玉利用在伪县政府当会计员的机会，从他们没收来的进步报刊堆中偷来的，只是残缺不齐，日期错乱，但我们爱读它，并不只因它是新闻。

一九四三年抗战到了更加艰苦的年代，我仍常到他家，这时他生活更困难了，傅德玉生的三个孩子，因营养不够，一个已瘫卧在床上，站坐行走都不能。大人也拖得面有菜色，十分疲困，然而当我们相聚谈话时，他还是与前一样倔强，对前途充满信心。只有一次，当他向我谈及自逃离成都后一直未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显得非常懊恼与焦急。一个早上，有个叫刘连波的来看他，坐下来讲了些理论社会政策工作之类双关的话，但他只淡然地讲了他目前生活困难的情况，其他什么也未讲。待这位客人走后，他才同我说：“你知道他现在是人是狗？算了。”原来这刘连波也是地下党的，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但因不在一个组织内就不好讲什么了。从这件事我看出他警惕性很高，因肯定不了刘连波当时正以国民党的县参议员的公开身份四处活动是怎么回事。其实到解放时才知道，这刘连波那时还是在为党工作，解放后就任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长。在一九四三年这段时间，我们有时照旧去

西湖边的茶馆坐坐，由于我不主张他去正街一家袍哥大哥开的永善茶馆喝茶，他一面指责我的学生气，他说你又不与那些人同流合污，怕什么，还该对社会多些接触和了解。但另一方面他又将就我的主张，还是到西湖边去。有时我们爱讲鲁迅的硬骨头，讲他那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对鲁迅作品中打落水狗的主张，十分赞成。在谈得精神振奋时就对当时大大小小的叭儿狗们痛加指斥，就好像恨不得立刻将其打落水中又从而打之一样。

我从乡下到城里来，有时夜间就住宿在他那破厅中的凉床上，我们总是在油灯下深夜谈心，话题很广，除抨击当时政治上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外，在文学上对高尔基、屈原等人的作品和为人，也是随时讲到的。记得有句屈原的话他特别爱在口边讲：“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在一个黑夜，我与他正坐在进门左侧他与德玉同住的小屋里，忽听外面有人讲话的声音，他站了起来披上长衫，拉着我迅速地从进门的一条巷道转了出去，与进门的人反方向走，正门南开，不会碰面。他那夜从西门出城，到乡间一家亲戚处去了，我则分手后又转回西湖，住宿在一个叫杨潮声的朋友家中。后来知道，那天夜里来找他的人确是国民党县党部的爪牙，也可能是摸不清他的底细，白天不便公开抓他就夜晚找到他家中来了。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我在自贡市一家小报找到一个工作，算是在经济上又有了微薄收入，便住在自贡，只有时才去他家中。到下半年天气已较冷了，他突然来到自贡市看我，告诉我他已与党组织联系

上了，并说他将那间祖宗分给的小破屋卖掉了，即将与傅德玉带着孩子离开富顺去成都。我真为他高兴，他现在新做了一件兰布长衫，人也显得年轻了。晚上我们谈到很夜深，还是免不了对抗战的前途议论一番，不过这时已知道德、意法西斯垮定了，日本侵略者的日子也不会长久了。但对我们民族的前途还是有一种担忧，对个人前进的道路也相信不会是平坦的，这次是我用了屈原的一句话作为话别的结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解放后我又回到富顺工作，几年来只知他在成都，他在几年当中只写过一次信，讲他与德玉生活还好，并在成都、雅安间卖点生意，我知道他讲的“生意”就是指党的事业。五〇年秋天，大家的工作都很忙，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说他在双流傅家河被土匪打死了！

蜀屏未死于地方军阀手中，未死于日本侵略者手中，也未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下，却死于土匪的枪口下；不死在黑暗的年月，却死在黎明之后。听到消息使我陷入极度的哀伤，未想到六年前那晚的相聚终成永诀，而那时共同追求的新社会竟没有他生活的权力！

十年浩劫中，德玉还来富顺看过我，她已无太婆了，不过还很硬朗，不料过了几年，德玉也死去了。以后他的女儿仁聪又来看我，也成中年妇女了。四十年前的往事，时在心中不能忘却，现在把它杂乱地写出来，权作为纪念蜀屏的一瓣心香吧！

苏铁生

从追随孙中山到大总统府秘书长

一九一二年二月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四月，重庆蜀军政府与成都大汉军政府合并，谢持任四川都督府参赞。一九一三年被选为北京参议院议员。三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于上海车站，暴露了他称帝独裁的野心。六月，谢持参加了黄复生及宋教仁秘书周予觉等十一人组织的刺杀袁世凯的活动。周予觉叛变自首，谢持等以“血光团”被捕。后因参议院抗议政府擅捕议员，“血光团”事又查无实据，袁世凯被迫释放被捕者。谢持获释后，风闻袁欲派刺客行刺，遂仓皇逃往日本避难。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精神再举革命。许多国民党人因反对盖手印和宣誓效忠孙中山等规定而拒绝加入。在急需干部的情况下，谢持经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英士推荐，被孙中山留在总务部（革命党办事机构）工作。他秉承孙中山意旨办事，一丝不苟。先是办理旅日党员生活补助，有的党员嫌少，用手杖揍他，他也决不任意添加。很快受到孙中山的信重，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副部长，兼四川省主盟人。一九一六年，黎元洪恢复国会，谢持回国参加议会活动，在北平上层进行工作。一九一

七年七月，张勋拥清帝复辟，搜捕革命党人，谢持逃往上海，随孙中山乘“海琛号”军舰南下广州，号召“护法”。九月，广州成立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孙中山为大元帅，谢持被任元帅府参议，代理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次长，代理部长等职。一九一九年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任命谢持为党务部长，主持日常党务工作。

一九二一年四月，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任大总统，谢持先任总统府参议，后改任秘书长。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乱，炮击总统府，谢持随孙中山逃走上海。一九二三年陈炯明被驱逐，孙中山重返广州，命谢持留驻上海管理党务，“委任谢持为全权代表”〔注〕付以“孙文”印章，表示了孙中山对谢持极大的信任。

召开西山会议，另立“中央党部”

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祸患生于肘腋”，使孙中山认识到只有改组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才能实现革命的理想。他断然排除了党内右派势力的干扰，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定谢持、汪精卫、胡汉民、林森和李大钊组成五人主席团。会上，谢持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五监委之一。鉴于会前孙中山把阻挠改组的张继加以囚禁，又把破坏联共政策的冯自由开除出党，因此，谢持没敢明白表示反对联共政策。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触动了国民党右派的阶级利益，他们对于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十分忌

恨，对于蓬勃开展的工农革命运动十分恐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谢持忍耐不住，公开带头反共了。他自认为“洞悉共产党诡谋，并得证据……”，“从上海跑到广州，以中央监委身份和张继、邓泽如联名向孙中山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在他们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中宣称：“现查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及宣言……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请从速处分。”强调：“为本党生存计……决不宜党中有党。”六月廿五日，谢持又和张继以中央监委身份正式同苏联代表、国民党中央特别顾问鲍罗廷进行谈话，公开表示反共立场。由于孙中山坚持了联共政策，平息了这次反共活动。但国民党中央又决定设置国际联络部，限制了共产党人的活动，反映了对右派的妥协，为他们以后进行更大的分裂活动种下了祸根。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病逝，谢持、张继等积极准备分裂活动。十一月，谢持、张继、邹鲁、林森等十四名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和递补执委，非法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顾问鲍罗廷解雇案》、《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党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案》等十几个宣言、通电和文告。狂妄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的职权，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中央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谢持、邹鲁被永远开除党籍。谢持等人

并不因此收场，相反也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此，广州国民党中央授权国民政府，全力制止其开会，并下令通缉叛党分子归案严办。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发出了反共信号。谢持、邹鲁喜出望外，连忙拍发贺电致意。

参加反蒋各派的联合倒蒋活动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公开反共，宁、汉、沪实现了反革命的合流。谢持被选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一九三〇年三月，在新军阀权力争斗的混战中，国民党内反蒋各派联合起来，谢持、邹鲁代表西山会议派参加了在北平组织的“国民党中央扩大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与南京对抗。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林森、谢持为国民政府委员兼中央扩大委员会常务委员。九月，张学良率军入关，阎、冯战败，北平国民政府垮台，谢持逃往天津租界避难。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谢持由北平迁居上海。十二月，孙科又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与南京蒋介石对抗，谢持因病未去广州，仍被推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不久，在全国人民谴责下，蒋介石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宣布“共赴国难”，广州“国民政府”取消，改称西南政务委员会，谢持仍为委员。

由反蒋到拥蒋

自一九三一年底，谢持病瘫半身不遂后，一直在上海养病，不再从事权力斗争，解除了蒋介石对于他的疑忌。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在

南京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蒋介石已是羽翼丰满，确立了独裁统治。经过一番拉拢，谢持的态度明显地转到拥蒋立场上去了。他除了抱病参加第五次代表大会，还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西南政务委员会成员解散组织，服从南京政府领导，并催促西南国民党人消除隔阂，参加大会。谢持在这次大会上再度被选为中央监委和国民政府委员。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时局紧张，谢持遂由上海启程乘轮船回四川。路过南京下关时，为了报答谢持的合作，并表示对元老的尊敬，蒋介石亲自登轮送行，以示礼遇。

谢持回四川后，先住重庆，不久迁成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六日病故于寓所，终年六十五岁。中华民国政府明令国葬，葬于成都外东岷江林场墓园。邹鲁为之撰写《国民政府委员谢持墓表》。

【注释】：①中山电令原文。

易昌棣倩愚先生及夫人宋令修之生平

李湘璠

中国同盟会老革命家及南社进步诗人易昌棣、倩愚先生（见柳亚子著《南社纪略》197页及郑逸梅著《南社丛谈》580页），生于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卒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享年六十四岁。世居于四川富顺西区九洪乡之羊山。先生毕生勤政好学，诲人不倦，敦宗睦友，乡里称贤；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秉笔直书，痛识时弊，诸品族，尤有口皆碑，向为同辈礼重。故其歿也，云集奔丧之亲故门人、海外侨胞及各界人士，竟达数千。

回顾先生生平，身经道路十分坎坷曲折。青少年时，聪明颖慧，读书过目不忘，博览群书，汇通中外。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十四岁，考中秀才。后四年去四川资州艺风书院就读，文思益进，品学俱优。三年结业，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前夕，因鉴于清庭内则政治腐败，外有强敌侵袭，仍坚持治学，攻读自励。久之，朝政日非，国情每况愈下，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逃名避世，仁智之士耻不屑为，乃

毅然习经世之学，广交贤杰，以备为国效劳。这时泸州高爽泉侍御，总教经纬学堂，慕先生品德学行，延聘监学。先生莅校，宵旰忧勤，奋力培育，门墙桃李，遍布蜀中。谢持、曹笃、黄仲德辈，皆师事之。旋即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与张培爵（川五）、余英（简成）、余切

(公孙长子)等，以学校为护身符，共谋发难苟义。虽皆失利，而志不移。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谢持等领导之成都起义事败，清政府侦骑四出，按名索捕革命党人，谢走泸州匿先生家，方得脱险(见谢持《天风海涛馆六十自述》)。次年先生北上居京师，反清活动益烈，亟赞汪精卫、黄复生、彭家珍诸人狙击摄政王与禁卫军帅，虽未竟成功，而革命气势已逼清室逊位。民国肇造，先生任稽勋局审议官。袁世凯将窃国复辟，嫉先生明察，又恶其不受笼络(刘师培劝先生加入筹安会，被严词拒绝)，继致培爵于死地之后，又流言诬先生参与密谋，制造舆论。张培爵以反袁称帝故，由四川都督去位，避居于天津日租界，防范本严；同盟会叛徒陈乔讨，受袁世凯重贿，勾结特务李杰三私造伪证(制袜厂商业合同)诱培爵外出，遂为袁部军警所捕，旋即英勇就义。时在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四日。事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记张君列五被难事》一文，作者梅际郁。先生既蒙冤诬，难以澄清黑白，居京如芒刺在背，不得已于民国四年(1915年)转徙西安，沦落近三载。幸能行医度日，固穷砺节，处之泰然。不久真相大白，诬案不攻自破，先生方于民国六年(1917年)冬，离陕南游。客居上海时，经友介绍参加南社。因贫，较少参与“雅集”，而为诗多忿世忧民之作。无何，“护法”讨段(祺瑞)军兴，中山邀至广州幕府，任命为司法部高等顾问官。居数月，先生以职闲无功，心耻尸位，因上书辞职，于民国七年(1918年)秋，由广州乘轮泛海，寄寓英属槟榔屿(今马来西亚)。先生襟

怀旷达，文雅谦恭，谈笑风生，常使四座倾服。游踪到处，毕受欢迎。民国十年（1921年），南洋各界推先生创办《华侨日报》于檳城，用代喉舌。该报自先生主笔以来，风格新颖，民主空气尤浓，向以明是非，辨善恶，寓褒贬，故言敢骂，驰誉海外。但是风云不测，发刊期年即被英政府指为言论有损政府条令，予以封闭。经多方努力，明年再办《华侨新报》于原处。先生吸取往昔经验教训，再接再厉，旗鼓重张；一应措施，力求合理。更尊重智、体劳动，密切与当地工人、知识分子结合，倡立“平民朋友协会”，俾作后援。四方从者咸集檳城，声势浩大，英帝当局为之震恐。当时先生已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醉心于社会主义制度，方将有游欧之行；岂知一日偶步街头，不幸竟罹车祸，重伤逝世！肇事者乃英人。时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农历八月。先生向无蓄积，儿孙俱在国内，突然人天永隔，无法归葬！尚幸先生门生故旧遍于南洋，群起筹办丧事。落殓营葬之期，扶柩哀号与随行而送者甚众，且多劳工。卜葬于檳城华人公墓，地近双溪滑智教乐寺墓园，有碑记其始末。碑文为文学博士江亢虎撰书。

先生在世，善为诗词，与南社同乡雷昭性（铁崖）及张光厚（荔舟）交谊至深，相互唱答之时尤夥。先生遗著《惺惺诗稿》，诚如欧阳永叔所撰《梅圣俞墓志铭》语云：“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巧怪。”实当之无愧！先生思想先进，气度恢阔，兼与辛亥革命诸勋要接触频繁，所为诗歌，反映时代现实者极富，最宜称道者，应是其不同凡响之艺术特色。如《留沪歌行四章》，对贫苦失业大众之刻绘，生动逼

真，感时伤世之情，溢于言表。《以物为诗四律》，每律以八种动物运古典成诗，讽世与自伤寓意均深，为前人所罕有。《落花词百首》，揉合诗、词、曲精华，而脱出其韵律与格式之板滞，另成别体，可补新旧体诗词之不足。至其《檳城答留法勤工俭学诸生一百韵》，凡一千言，由个人际遇推及社会国家，爱国主义色彩颇浓；且所押百韵全属平声，一韵到底，无转韵换韵。读之音调铿锵，圆润和谐，宛似行云流水，绝无木强之概。古今人长诗，能如此者，实为少见。

先生夫人宋令修，生于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年），卒于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川富顺县大岩幽人。自幼聪敏明慧，工诗与词，佳作颇多。有弟曰育仁，号芸子，亦一代文豪，著述甚丰，已出版者达十余种。平日姊妹相与唱酬诗章，倍显才华出众。著有《裳华阁诗存》一卷。该集曾列目于《四川省通志》与《富顺县志》两书，有少量木刻赠本传世，昔年京、津、沪、蓉老宿中，多传抄吟诵者；以其清新雅秀，士林评价极高。

《醒园诗稿》诸诗，向多流散海外；偶有寄回，其子显纶辄珍藏之，尝为葺注自存。民国十八年（1929年）请其舅父育仁作序，行将刊刻；殊不久育仁去世。自后，宋、易两家渐贫，无力刻印，梓版事遂止。再历经解放前匪患、兵火、迁移、日机轰炸，及晚近史无前例之十年内乱，家留残稿损失殆尽。延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初，清愚公之孙儿公度、志超、奉倩与孙女静娴、敬端辈，为保存文献，复于亲友世谊中尽力搜罗，幸得蠹蚀残篇若干页，经公度精心缮抄，集成

冊，經余編校整理，意欲出版流傳。余以世得晚而忝居末學，及讀竟全稿，感其翔實靈活，光焰照人，史料、文學價值俱優，特予系年、校訂、標點、箋注，並書其梗概。

編 者 按：

“南社”成立於1909年11月3日，主要領導人有柳亞子、陳去病和高旭等。“南社”是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們所組成的革命組織。它“以文字革命為職志，而意實不在文字間”。“兩者，對北而言，寓不同滿清之意”。辛亥革命後，該社宗旨，又有變化。社員活動各異。本文言易昌楫情愚先生於1917年冬……客居上海時，經友人介紹參加“南社”。（已在辛亥革命後）未談及參加“南社”後的具体活動和著述，是為遺憾。今僅以資料刊印、留後來的補充。

叶 希 文

一九八五年九月